

怀念挚友谢永旺

□陈丹晨



谢永旺

2022年8月30日，谢永旺君因病谢世，许多《文艺报》老少同事都致以深切的哀悼和追思，写了许多深情怀念的悼文，可以感受到他在人们心里有多么重要，留下多么深厚的友情。我的心里也一直涌动着哀痛和悲情，像有许多话要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总觉得他还鲜活活着，随时会打电话或发微信联系。那不是梦，从我到作协、《文艺报》工作开始，43年来与老谢不曾间断过交往，直到2022年6月，还有信息、电话比较密集的往返。7月以后，只有我发给他的，得不到他的回复，终于得悉他的病情加重了，接着传来他的噩耗。这些年，因为同辈同事事都己高龄，常会经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哀伤。但是，老谢让我感到格外沉重，始终不相信他已远去。

这大概与他和我的关系有点不寻常有关。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艺报》同时恢复活动或复刊，我是在那年6月到《文艺报》工作，恰逢复刊后第一期刚刚出版。编辑部正式建立了领导班子：主编冯牧、孔罗荪，编辑部正副主任谢永旺和刘锡诚、陈丹晨。就把我和他开始了合作搭档的关系。1985年起，《文艺报》由刊改为报纸，老谢和我被任命为正副总编辑，又是合作搭档的关系。1990年初改组领导班子，老谢和我同时退出离开。这样，我和他十多年来无意中真的“共进退”了。这以后，我们因是住同一栋楼的邻居，有时还一起出游，更不必说经常聊天谈心聚餐了。如果说我们是推心置腹的挚友，一点也不夸张的。

我最早看到他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在北大图书馆的一次文学聚会上。他高高的个儿，面如满月，稳重谦和的仪容，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就如后来人们戏说《文艺报》有四大美男子，谢永旺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几位是冯牧、孔罗荪、唐达成。我与他相处多年，从未见过他对任何人疾言厉色，总是温润平和可亲。他主持编辑部工作，对左右同事特别是年轻编辑平等相待，亲切随和，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专长，许多年轻人工作了几十年都能得到及时升迁，而不为资历学历深浅所困，所以他深得大家敬重。

人们都谈到老谢许多年总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从不用公车接送。他的办公室虽是独自一间，除了办公桌、一张小沙发，别无长物，他也从不要求增加什么。他的衣着、饮食等等俭朴的作风完全是他很自然的生活习惯，不因职务变化而变化。最近翻看旧照片，看到当年编辑部常常在春秋季节组织全体人到长城、西山等郊区游览，拍了一些照片，如是一些人或全员集体照，看到老谢总是站在边上或后面，他从不在中间站（现在叫C位），大家都谁爱怎么站就怎么站。编辑部老小都唤他“老谢”。这些虽是细小琐事，却说明他没有如今世俗的“讲究”和“特殊”。

我初到《文艺报》时，编辑部还设在礼士胡同两间屋子里。他带着寒风、李燕平、陈新民几个新手负责稿件的选题、协调、组版，以至校对、付印、出版……这些看似事务性却是事关整体的总编室工作，他都默默地任任劳任怨地干了下来。我与他虽是初次共事，他作为在《文艺报》已经工作了20年的老人不仅不见外，对我还特别信任。那正是整个社会思想处于冲破藩篱呼唤“解放”，又和“文革”思维胶着对峙之时。当时，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光年写了一篇稍带“风险”的文章给《人民日报》打出小样，准备发表。老谢是光年信任的老部下，光年把稿子给老谢看且征求意见。老谢又给我看叫提提意见，我提了些意见，老谢听了觉得有道理，就说：“你给光年去说说吧！”我说：“我不去说。他是征求你的意见，你若觉得有道理，愿对他你说你就去说。”于是，他把这意见转告光年了。光年从谏如流，进行了修改。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对文艺界影响很大，把长期束缚的“文革”思维进一步彻底解脱。光年后有几次给我的电话里或见面时就说我话好。我知道与此有关，其实小事一桩，却知道是老谢在他面前说了我的好话之故。

类似这样的事，后来又有过几次。老谢和我合作相处十多年从没有齟齬矛盾，就因为相互尊重和谅解。我的脾气不好，遇事会说一些不同意见，有时他会笑着调侃我：“你就是反潮流。总‘犯上’（指对上面对指示）。”我就会说：“不听不听在你，我把话说了尽我责了。”即使这样，他也不以为忤，因为他知道我是好意。多数情况下，他总是处理得比较稳重妥帖，特别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处理办法。1981年，有一个省报发文批判一位作家，上级领导认为应该重视，光年就要《文艺报》转发。老谢不得不命在总编室直接发稿。理论组组长何孔周得知后紧张地告诉我，我就在会上对主编孔罗荪陈述三点理由力争不可。罗荪找了光年转述了我的意见，光年也就同意撤稿，只是要我另写一篇有说服力文章代替。过了一段时间，上面对这件事有了新的和缓的说法也就不再批判了。我想我是嚷着说着，老谢却是不声不响地把这篇批判稿用拖延的办法撤回了。

又一次，上面交下来一篇大文章，主要是批评了文艺界一些“负面”现象，认为提出“创作自由”的同时还应该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要用“文艺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我们开会商量怎么处理，恰好老谢到外地去了，没在场。我认为发表没有问题，但文责自负，我们也不宜掠美，不赞成以我们从不曾用的“文艺报评论员”名义，认为这篇稿可以另用一个其他名字。但领导认为不行，后来会上得出的折中意见是，凡是稿子里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保持原貌，非改不可的就修改一下。会后，我等老谢回来，向他报告此文原委。他认认真真下功夫作了修改，用“文艺报评论员”署名。最后文章发出来后，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社会反响也不错。我从这件事又一次感受到老谢的定力。

那时在《文艺报》工作，经常会遇到上下左右的舆论冲击。1987年，有一位领导召见我们四个正副总编谈话，要我们积极投入到当时的有关活动中去，还出了两个题目，要求完成后发表在《文艺报》上，并强调此事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我听了心情很复杂，又不可能与别人交流。我们走出大门却都笑着对老谢说：“这事只有你主持去完成了！”老谢却不愠不躁地笑而不答。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幻，这事后来也没有人再提及了。

后来又有过事关他切身利益的工作安排，他也能不计个人名利放弃了。许多老同事老朋友更多地了解他温和谨慎的一面，一般不太知道他在重大问题上却会很坚定，也很有勇气。不过他的表现形式不是那种很张扬外露的，因而不为大家所知。

1985年初，老谢被任命为《文艺报》总编辑，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抱着谨慎敬畏的态度。他从1956年大学毕业后就到《文艺报》工作，几十年来深知这个报刊经历跌宕起伏的历史和担负任务的重大。从1949年创刊起，主编都是文艺界声名如雷的大家，如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以及后来的冯牧、孔罗荪。他对我说过他的心情，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文艺界许多前辈名人对本刊期望很高，常有各种意见传来，有时也会衍生一些矛盾。另一方面，当时社会环境和文艺界的思想交锋和对峙都相当错综复杂而又尖锐。《文艺报》恰身处矛盾的旋涡，直接关系到版面，需要谨慎应对。所以他就全身心扑在刊物工作中，这也是人们谈到他自己写的作品或文章比较少的重要原因。他不是不想写，不是没有可写。他几次对我说，想暂离编辑部工作请个把月的创作假写点东西，说连他太太王伟都希望他别都陷在编辑部事情里，影响写作。我也很同情他，支持他的想法。但是想归想，他却始终放不下日常工作的羁绊。

《文艺报》改成报纸后，继续推出和传播了许多重要文章、活动和信息，对文艺界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影响。诸如举行“青年文学评论家座谈会”，上世纪80年代新出现的青年评论家群体由此受到文坛热情关注；又如还举行过关于巴金《随想录》座谈会，是此书五卷成后第一次被文艺界高度评价和阐释，许多著名作家发表了剖切而精彩的意见。会议报道后，上海文艺界也随即举行了类似的座谈会，使《随想录》有了更深远的影响。类似更多的活动和报道都是在老谢总编辑直接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我这篇小文在此只是略举一二而已。

80年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历史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都正发生巨大转变。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全心全意搞四化的年代里，《文艺报》作为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确实起着相当有力的特殊推动作用。人们常说“编辑是无名英雄”，指的是编辑因为成就别人而付出的心血汗水和辛勤劳动常常不为人所知。我想，把这个意思用在老谢身上是很确切的，他在《文艺报》做出的重要贡献为当代文学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往事深情

□曹凌云

仍记得32年前的1990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唐湜先生。那时我还是学生，他应邀来我就读的温州市第十五中学做诗歌讲座。那时唐湜先生70岁，圆圆的脸庞，微胖的身材，深沉的态度，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讲座结束后，我们几个写作尖子与他近距离对话。我读过他的许多诗作，能讲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来，自然成为对话的主角。他慈祥的目光、温和的语言和亲切的微笑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那天我们谈到夜色苍茫，才送唐湜回家。

我参加工作后，时常到温州花柳塘唐湜家里坐坐。他的居室50多平方米，陈设简陋，小小的客厅兼作书房，摆满了书籍和杂物。尽管唐湜是大诗人，我才刚刚学习写作，以他为师，但他的亲和力使我没有一点生疏和拘谨，在我们轻松自在的长谈中，充满着长者对晚辈的关怀和爱护。经过多次深谈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我记不清我和唐湜有过多少次交谈，交谈中，他说话虽然有些含混不清，但思路很清晰，谈到一些往事时，都能详尽叙述。他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坦率直言文坛上的人与事。他喜欢谈胡风，喜欢谈陈敬容，当然也谈些自己的经历，几乎每一次都少不了这些话题。他谈起陈敬容时曾说：“陈敬容72岁时，心情凄凉，身心交瘁……偶然得了一次感冒，竟转为肺炎，昏迷了几天就去世了，没留下一句嘱咐的话。”

我还记得，在唐湜先生来十五中做讲座之前的1989年秋天，赵瑞麟先生也来过十五中做讲座。

赵瑞麟的讲座大概是学校老师宣传和组织得更好，慕名听讲座的师生太多，老师把原计划的讲座地点从阶梯教室改到大操场上。赵瑞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却身材挺拔，声音洪亮，思路敏捷，还显得那么庄重、宽厚和慈祥。讲座后，赵瑞麟与学校几个写作尖子座谈，他说：“祖国需要多少人才、多少知识分子、多少有着崇高奋斗目标的后代子孙，就可以看出文化教育、特别是中学生教育的艰巨任务了。”我聆听着他的每一句话，也一直仔细打量着他。赵瑞麟回南京后不久，为我主编的校刊《龙腾》寄来题词。

记忆的闸门一打开，我又想起与金江先生交往的一些事儿。印象里，金江先生有着硬朗的身体、爽朗的声音、利落的动作。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温州龙湾区文联工作，请他到龙湾的一些学校里给学生讲寓言创作。他的讲课就像他的寓言作品，善用比喻、夸张、象征，讲得生动而幽默、风趣而幽默，讲课的效果很好。他每讲一次课，便会让许多学生喜欢上寓言，有编辑校刊的老师告诉我：“金江老师的讲座之后，我收到大量同学们写的寓言习作。”

我还请金江参加龙湾的一些文化活动，他从来不摆谱，不推辞，更不自视清高或高人一等，一来龙湾就融入文艺工作者之中，谈天说地，畅所欲言。我们探讨文学的话题，沟通创作的计划，也闲聊生活琐事，甚至不回避一些八卦新闻。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寓言、童话等儿童文学的写作，他对儿童文学的创作带着本色，保持了孩童的感觉，其作品常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关于莫洛先生的记忆，总是特别温暖。我认识莫洛先生，是我读初中时，从他的诗歌里；他认识我，是在一次温州作家采访的途中。那时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在温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小文，可谓初出茅庐，受到温州作家协会的邀请，参加采风活动。记得那天一大早，参加采风的老年中青作家代表在墨池坊集中上车，我坐到了大客车的最后排座位。路途上，有作家指着我问莫洛是否认识我，他回头一看，摇了摇头回答：“不认识。”那位作家便报出了我的姓名，他再次回头，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声地说：“嗨，大名鼎鼎呀。”顿时，全车人都笑了，氛围很轻松，我红了脸，心里却是何等的受用与畅快。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老前辈，比我大52岁，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33年，不料他也抽空阅读我稚嫩的作品，还记住我的名字。这是莫洛给我最初的鼓励。

有一年时间，我在《温州日报》的一个版面上开设专栏，文章不过千字，内容大多是针对某些社会现象的忧思。过年时我去看望莫洛，他告诉我这个专栏“每篇必看”，还拿起其中的一期报纸，指着我的文章《心灵的呼吁》说：“写得好好呀，一个文化人的责任感，也是我的‘心灵的呼吁’。”莫洛的赞誉让我喜不自禁。我们谈过去、谈当下、谈创作、谈文坛，他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言简意赅，语重心长。他寄大希望于年轻人，希望年轻人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对时代都要充满爱，让爱的薪火炽燃。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林斤澜先生，是在1991年秋天，林斤澜带着汪曾祺、唐达成、刘心武、邵燕祥等作家来永嘉楠溪江采风，寻山问水。我当时初学写作，凭着初生牛犊的勇气前往永嘉拜访他，他笑容可掬，与我聊了话，还给我题了字。最后一次与他相聚是在2004年夏天，林斤澜

应邀参加由我牵头举办的张璠文化探源游座谈会，他年已耄耋，但红光满面，步履稳健，神采飞扬。这一次，我们就张璠文化、龙湾旅游、温州文学等话题谈了许多，可算是一次畅谈了。

2010年冬天，我调到温州市文联工作后，更加关注温州籍的文艺工作者，特别像唐湜、莫洛、金江、赵瑞麟、林斤澜等“大师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得到读者的喜爱和信赖，经得住读者的评判、时间的洗礼和时代的考验。而此时，唐湜、赵瑞麟、林斤澜三位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莫洛和金江先生不久也驾鹤西去了。

我在文联工作，有机会牵头编辑《唐湜全集》。我与唐湜的次子唐彦中开始整理、收集唐湜的作品。据我们估计，唐湜的诗歌、评论各有九十余万字，译作有五十万字左右，戏剧、散文各有三十余万字，还有数量不少的信件。我一边进行着《唐湜全集》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一边有感而发，开始陆陆续续写起关于唐湜的文章。

在写唐湜的人生和创作历程时，会写到他与莫洛、赵瑞麟、金江、林斤澜等的交集，因为正如《生为赤子——唐湜与他的文友们》（下文简称《生为赤子》）开头所说的，“他们都出生在上世纪初的温州，他们是同学，是文友，是患难之交，是革命同志，他们从瓯江南岸起步，心怀赤诚，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于是，我又把笔触延伸到莫洛、赵瑞麟、金江、林斤澜的身上。

在温州文化界，唐湜、莫洛、金江被誉为“文坛三老”，他们是社会的尊者、育人的能者、心怀国家文学事业的大者。我有幸与“三老”都有过较为亲密的交往，唐湜是我的恩师，莫洛提携过我，金江可算老交情。我虽然与林斤澜交往不多，也就三五次光景，可是近十年来，由于工作原因，陆续通读了十卷本的《林斤澜文集》，他却成了我“接触”较多的老前辈温州籍作家。

我与赵瑞麟交往最少，但我也阅读了他的多部作品集，了解了他的一些人生过往和创作经历。在写赵瑞麟的过程中，我多次采访与赵瑞麟交情甚笃的温州作家翟光辉，向他询问一些细节，他也解答了我的一些疑问。我还多次与赵瑞麟的长女赵苡微信联系。我说：“我想去南京拜访杨苡先生（赵瑞麟夫人），想跟她聊聊赵先生，想表达对她和赵先生的崇敬。”赵苡说：“我母亲毕竟是100多岁的老者，不便打扰，但我会尽己所知回答你的问题。”

因此，在写作时我成竹在胸、运笔自如，如回忆般温暖，如江水般流畅。

在我写唐湜、莫洛、赵瑞麟、金江、林斤澜的时候，我还时不时要写到两个人，就是胡景城和郑伯永，因为他们同为“同学、文友、患难之交、革命同志”，甚至胡景城和郑伯永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始终在第一线出生入死，百折不挠，是值得我们缅怀和尊敬的革命者、好干部，为温州的解放事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我没有与他们交往过，但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两人我也不得不写。

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我们的祖国，山河破碎，无辜的百姓流离失所。身为温州中学学生的胡景城、赵瑞麟、莫洛、唐湜、林斤澜、金江和郑伯永，他们不只是关注自己的学业和己己的悲欢，而是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满目疮痍的祖国大地和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他们冒着随时被学校开除、被当局逮捕的危险，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

温州中学是进步思潮的大本营，他们和爱国、进步的同学一起，参加共产党暗中领导下的野火读书会、永嘉（温州）战时青年暗务团。他们汇集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表达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他们通过出墙报、印传单、编画刊、办画展、设立书报阅览室、开展话剧公演、街头演讲等多种方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使得抗日救亡运动在温州蓬勃掀起，播下的爱国种子在瓯江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此时的温州，还有一批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年轻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多元文化并存的上海是新兴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中国革命“红色源头”城市上海光芒四射，备受人们瞩目。他们陆续来到了上海，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领导者鲁迅先生的直接指导下，以刀笔为枪，奋战在民族救亡文艺运动第一线。他们就是温州版画家林夫、野夫、张明曹和王良俭等。

在鲁迅先生逝世、抗战爆发之后，他们毅然返回温州，在连天的战火中，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他们以赤诚之心，筚路蓝缕，风雨兼程，行进在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的道路上，甘心奉献青春，直至奉献生命。他们与胡景城、莫洛、林斤澜、唐湜等是同道中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走到了一起。

2021年8月，2021年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申报开始，基于以上的写作与掌握的素材，我申报了长篇纪实文学《生为赤子》的创作选题。我思考再三，《生为赤子》以九叶派诗人唐湜为中心，讲述唐湜和他的文友莫洛、赵瑞麟、胡景城、林夫、金江、林斤澜、郑伯永等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用断点式截取替代全局式概述，来反映浙南地区一批充满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激情，投身于革命事业，凭借巨大的精神力量，收获学业上的累累硕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创作《生为赤子》之前，我已为唐湜、莫洛、赵瑞麟、胡景城、林夫、金江、林斤澜、郑伯永等写



下了一定数量的文稿，我的主题设定是根据他们人生故事的文学张力而来的，是作品中的人物自身所携带和存在的问题意识而来的。

唐湜、胡景城、莫洛等的家族在温州属于名门望族，上辈族人基本上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但深重的国难让许多家族成员包括身边的亲人、爱人仰视红色人物，心中萌发和积聚了爱国之情，最终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奔向了战火纷飞的第一线。比如唐湜的大弟唐文荣、大妹唐金金、小妹唐小玉、小姨王静香、表哥陈桂芳、表妹林翹翹，比如胡景城的母亲姚平子、三弟胡景灏、四弟胡景焜，比如莫洛的妻子林绵、林斤澜的妻子谷叶及赵瑞麟的妻子杨苡等，他们也都投身到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有属于他们的忠诚和英雄的故事。当然，他们在现实中有窘迫、压抑、痛苦、彷徨，甚至曾迷失自我和哀号呻吟，他们也有自己的亲情和爱情。

选择以唐湜为主线，自然离不开他在“九叶”中的八位诗友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袁可嘉和穆旦。这九位诗人曹生长于家国离乱之际，受过良好的中西方文学教育和文化熏陶，深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学成后多有漂泊的经历，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一颗跳荡的诗心，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积极而勇敢地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上世纪40年代，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作，明显受到西方文学的熏染，常有多层次的构思与深层的心理探索，较多地接受了现实主义精神和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风格，形成了他们的文学思想和艺术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新诗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现在距离他们成名成家已经过去70多年，而九位诗人和他们作品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反而发出更加迷人的光芒。《生为赤子》或多或少都给予记之。

三

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远去的背影，虽多为我早年的相识，但亲近如唐湜这样的恩师，也因时间久远，往事如烟，许多记忆被岁月冲刷得支离破碎，像被雨水沾湿的老照片般模糊不清。况且，他们的过往经历，我也没有全面、详细地掌握。全景式地写起来，确实困难重重。

为了追寻历史往事，精彩人生，获取更多的情节、细节，我开始系统阅读他们包括回忆录在内的文艺作品。故人往矣，而文字还留着温度，与我耳鬓厮磨，往日的情感由远而近，一点点回归，并日益深厚。

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寻访了书中主要人物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比如温州中学旧址、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春草池、籀园图书馆等，那里有他们青春的一部分，那里洋溢着温馨、和谐与诗意的生命，那里有遥远苍凉的历史烟云、有循着火去拓荒的坚实脚步声、有从斑驳旧影里响起的新曲……岁月迁流，世事繁变，抚今追昔，不禁百感交集。

在《生为赤子》的写作进入尾声的时候，我还走访了温州老城区“县前头135号”，这是一栋七间三层砖木混合洋式楼房，坐北朝南，北面临街，带西式装饰立面。这里是16岁的唐湜入党宣誓的地方。两年后的1938年，新四军在此设立驻温州采购办事处，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以上海红十字会的名义也在此设立办事处，配合开展工作，将大批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军用紧缺物资输送到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静静地从一楼走到三楼，唐湜先生入党的痕迹已不可寻，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深处，但我想，唐湜先生在这里抱定革命的决心，承担起所处时代赋予的使命，同时也让他的生命开始变得丰盈、多姿和壮美。我久久地站在二楼的窗台前，窗下是平整的柏油路面，午后的阳光把街上穿行的车辆照耀得金光灿灿，行人在街两边轻松行走，三两为伴地一起说说笑笑。

眼下正是人间四月天。

